

宋代诗话选读

张福勋 著



宋代诗话选读

张福勋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626 字数:298千 插页:2

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10089·454 印数:1—3,370册

ISBN 7-204-00238-5/I·33 每册:3.65元

序

吴调公

研究古代文学而不研究古代文论，对文艺现象的本质的探索便难以深入。古代文学史是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阐述，也是这一系列过程的运动规律的揭示。但不管你如何研究和分析那些规律和过程，总得有个思想和理论的指导。对古代文学这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说来，有一种历史性的审美规范作为无形制约。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审美意识作为指导？究竟是根据什么批评标准去衡量？究竟是运用什么方法论去进行分析、综合、演绎、归纳？这都涉及到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本质问题，概念与范畴问题，以及如何以具体作家、作品形态作为特定对象，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、社会思想、政治道德观点，特别是文艺理论观点，进行研究和评价的问题。

离开文学理论的引导，文学史的研究就缺少基础，更难以宏观处理；而从整个文艺学体系说来，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则又是虚实相兼，甚至于是一身二任的。懂得庄子文章的总精神之所以表现为一个“飞”字（见刘熙载：《艺概·文概》），就有助于对道家思想和浪漫主义的认识，也有助于对庄子其人其文，特别是对《逍遥游》的体会。懂得《诗品》所说的“建安风力”这一个特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和现实主义在汉代的历史表征，那么，对建安七子的

各个作品的风格异同的辨析，自然也就有了参照系统。

真理透过实践的成果而愈益显示其光辉。张福勋同志最近写成的《宋代诗话选读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在这书《后记》中，^①他曾经谈到在教学宋代文学的过程中，适当地运用了宋诗话中评论唐宋诗词的资料，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这确是甘苦之言。扣合古代文学实际，扣合文学形象，把从古代文学中概括出来的、与具体文学现象脉脉相通的规律、观点作为引导，作为津梁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，再从一般深化到个别，借镜古人的论断，哪怕片言只语，然而由于它们是从创作实践中喷薄而出的，带有直观意味和即兴色彩，高度凝缩，言不尽意，因而就必然促进人们意象的超越性和悟解的开拓性。中国的古代文论较之西方文论，就大体而言，更多地表现为画龙点睛方式，崇简净而薄烦琐，以少胜多。特别是诗话、词话，这特点就更显著。极咫尺千里之势。寥寥数语，内涵丰富。尽管这里也夹杂着一些片断的考证、辑录和不尽精纯的记事材料，但仍不失为具有民族思维特色的文论瑰宝。可惜过去学术界对它们注意还不够。虽然早已就有不少学者专家对此做过一些辑录、校勘、考辨工作，但从事注释、论析的人并不多，写成诗话研究专文的，据我所见，只有寥寥数篇，真是一大憾事！而福勋同志能就其长期寝馈，撰著成这样一部注而兼评的专书，从浩如烟海的宋诗话中精选出一些名符其实的代表作，发扬文学遗产的精华，充实了古代文学理论的薄弱环节，应该说，这对学术界是一个贡献，不由使我敬仰。

还有一点引起我兴趣的，就是福勋同志对宋诗话的

重视。他对历代诗话进行过研究，而研究专著的第一部，恰恰是宋诗话。我认为这是大有深意的。宋诗话不仅开后代诗话的先河，而且品汇众多，各有胜长，确乎是古代文学的宝藏，需要我们来汲取其精华。既有助于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，有助于古代文论的承传和发扬光大，也有助于诗话源头的把握，为了解历代诗话演变打好基础。

福勋同志的这本《选读》不仅有普及性，也具有学术性，可以说是深入浅出。之所以达到这一种境界的原因，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对宋诗话整体了然于胸，所以他能抓住关键，指出诗话在当时的繁荣情况，指出它如何兼具诗歌评论和笔记小说的特点，指出诗话的种类包括“专著”和“汇编”，指出它的演变过程是从“偏于记事”到“偏于论理”，特别是指出诗话的评论形式大多为“从容自在的闲谈”，“语气轻松，态度亲切，词语平易”，所以能使读者获得“严肃的诗理的启迪”和“艺术的美的享受”。对宋诗话有这样一系列的缜密的认知和深切的体会，这就说明作者的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的造诣非凡，对宋诗话有过精心琢磨，决非一蹴而就。

这里，就单单提出两点，我对福勋同志的真知灼见有所共鸣的地方，用以表明这本《选读》之使我获益。第一，福勋同志提到宋诗话既有诗理的启迪，也给予人们以美的享受，这种辩证统一的观点确很透辟。福勋同志以“严肃的诗理”说明宋诗话内涵，决不夸张。原来宋人的思维建构就理甚于情，再加上时代风气和“心学”思潮的多种影响，因而宋人不但长于辨析，也爱好议论；不但议

政、议兵、议史，也议字、议文、议诗。这可以说是宋诗话之所以张扬“诗理”的由来。但也正因为论诗、论文采用漫话形式，即欧阳修所说的作诗话可资“闲谈”（《六一诗话》），黄永思所说的诗话可“资谈笑之乐”。（《碧溪诗话跋》）。既然是闲谈、漫话，自然也就无拘无束，兴起而来，兴尽而止，亲切平易中显示真挚的韵味，得言外之意和耐人寻思之境，这也就是福勋同志所说的“艺术的美的享受”了。哲理启迪与美的享受二者互为交融，并不排斥。第二，福勋同志看到了宋诗话的发展脉络，是从“偏于记事”到“偏于论理”。这一句提纲挈领之言，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宋诗话的历时性的把握。我认为，宋诗话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以“闲谈”为目的，撷拾旧闻，品评诗人、诗作，间或也论及其他文体，正如魏泰所说的“即事而谈，随意而发”（《临汉隐居诗话》），可以《六一诗话》为代表。第二阶段的诗话，除仍然保留着一些前此的笔记特色外，诗话作者以诗歌评论为主要目的的意识，开始明确。这类诗话可以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为代表。用“阳秋”作为书名，可见其显然寓是非公论之意。这说明沿着欧阳修诗话发展到百年之后，以“诗话”为形式的诗论，其体例，其内容，已开始向诗歌理论的方向发展了。第三阶段的诗话，在“诗学”内涵上，较之前一阶段更为纯粹。撷拾旧闻的因素几乎完全看不见了。这样，诗话就成为纯粹诗学的阐发。尽管在形式上仍然是丛残琐语，不象西方文艺理论之发为系统性的哲学推理式论述，但它们触及的内容却都是出于审美沉思和创作甘苦，富有卓见而发人深思的。姜夔的

《白石道人诗说》肇始其端，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克绍其后，而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则更无愧于宋诗话的高峰。明代著名诗论家钟惺、王世贞、谢榛、王夫之，特别是清初神韵派领袖王士禛，都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。宋诗话的这段演变，福勋同志用一句简洁之至的话就把它概括了。希望读者不要等闲视之。这正是得之于以简驭繁、举重若轻的功力。

《宋代诗话选读》的指归，决不限于为诗话作介绍，或仅仅作为诗话学习、研究的辅导读物。它对于古代诗歌美学、古代诗歌鉴赏以至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等等研究来说，也都是一本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读物。

一九八八年五月于南京

前 言

诗话一说，始于北宋。欧阳修晚年所作《六一诗话》，是我国第一部诗话著作。自《六一诗话》出，诗话作者蜂起云集，诗话竟成为宋元以来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主要样式。

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，诗歌创作的繁荣，刺激了对于诗歌理论的研究。在唐诗极盛以后，一种随笔性的、漫谈性的，诗歌批评的体裁——诗话，便在宋初产生了。

这种诗歌批评的样式，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，作者不摆理论家的架式，不板教师爷的面孔，而是语气轻松，态度亲切，词语平易，随便说开。其文字短小而饶有情趣，论诗考义而略带谈谐。有如家人的聊天，于从容自在的闲谈中间，就已经受到了严肃的诗理的启迪，获得了艺术的美的享受。“使人心开目明，玩味不能去手。”（陈俊卿《碧溪诗话序》）。因此，大家喜闻乐见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“群众基础”，诗话便长足地发展了起来。据《王直方诗话》载：“刘咸临醉中尝作《诗话》数十篇，既醒，书四句于后曰：‘坐井而观天，遂亦作天论。客问天方圆，低头惭客问’。盖悔其率尔也。”“率尔”，活画出了诗话的形象。另，欧阳修作《六一诗话》，于卷首题词有云：“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。”“闲谈”，又道尽了诗话所独具的性格。

诗话，作为诗歌理论的一门科学，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，它的理论和学术价值非常珍贵和重要。可以说，诗话是一部以率尔、闲谈面貌出现的有关诗歌的百科全书，如同一座宝山，它既有无穷的美景供人们欣赏，更有无尽的宝藏待人们开采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介阮阅的《诗话总龟》，说它“多录杂事，颇近小说”；又评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，说它：“论文、考义者居多。”这纪事、评论、考据，便是诗话的三项主要内容。许颢《许彦周诗话》自序说：“诗话者，辨句法，备古今，纪盛德，录异事，正讹误也。”其中，“纪盛德”、“录异事”，或传写诗人逸事，或叙述诗作故实，或记载诗坛掌故，均属记事；“辨句法”，或品评诗人诗作，或考订字句名物，或诠释名篇佳句，或分析诗歌作法；“备古今”，追溯诗歌源流，研究诗歌体例，进行古今对比，说明承接关系；“正讹误”，分辨作品真伪，考证写作时间，指明用事原委等。这“辨句法”、“备古今”、“正讹误”，既包含评论，也包含考证。总之，“以前论诗之作或重在品评，或重在格例，或重在作法，或重在本事，自欧阳修开诗话之体，于是兼收并蓄，为论诗开了方便法门。”（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

诗话的记事，有对诗人生平事迹的记叙，特别是那些在官修的正史里无传的作家，主要靠了诗话的记载才得以留名，这对于后人研究这一部分作家，研究这一个时代的诗歌总貌，都极有价值。诗人花蕊夫人的情况即是一例。《中山诗话》记载：“孟蜀时，花蕊夫人号能诗，而世不传。王平父因治馆中废书，得一轴八九十首，而存者才三十余篇，大约似王建句。若‘厨船进食簇时新，列坐无非侍从臣。日午殿头宣索鲙，隔花催唤打鱼人。’‘月头支給买花钱，满殿宫娥近数千，遇着唱名都不语，含羞急过御床前’。”又《后山诗话》记载：“费氏，蜀之青城人，以才色入蜀宫。后主嬖之，号花蕊夫人。教王建作宫词百首。国亡，入备后宫。（宋）太祖闻之，召使陈诗。诵其《国亡诗》云：‘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。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’太祖悦。盖蜀兵十四万，而王师数万尔。”《竹坡诗话》也载：“‘冰肌玉骨清无汗，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一点月窥人，欹枕欹横云鬓乱。起来庭户悄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。屈指西风几

时来，不道流年暗中换。’世传此诗为花蕊夫人作，东坡尝用此诗作《洞仙歌》曲。或谓东坡託花蕊以自解耳，不可不知也。”《韵语阳秋》也说：“花蕊夫人亦有宫词百篇，……亦可喜。”（卷三）正是靠了诗话这些吉光片羽的记载，我们才得以对花蕊夫人及其作品有了了解。

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记陆游爱情诗事曰：“放翁少时，二亲督教甚严。初婚某氏，伉俪相得，二亲恐其惰于学也，数遣妇。放翁不敢逆尊者意，与妇诀。某氏改事某官，与陆氏有中外。一日通家于沈园，坐间目成而已。翁得年甚高，晚有二绝云：‘肠断城头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上春波绿，曾见惊鸿照影来。’‘梦断香销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’旧读此诗，不解其意，后见曾温伯，言其详。温伯名黯，茶山孙，受学于放翁。”因为曾黯曾亲受学于放翁，而刘后村又是陆游的学生，以上记载，就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确定性，这对于我们研究陆游的全部爱情诗以及深入探讨陆游的生活和创作，无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。

诗话的记事，还有对文坛轶事的记载。这些记载则更有助于我们研究作家的思想、性格、生活和创作。

而诗话中那些有关考证的内容，就有直接的学术价值了。葛立方自序《韵语阳秋》说：“凡诗人句义当否，若论人物行事，高下是非，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。若背理伤道者，皆为说以示劝戒。”经过诗话作者的考辨，错误的使“归之正”，而“背理”的，则“为说以示劝戒”。这样就不致以讹传讹而贻误后学了。有的问题经过严密的考证，甚至于“断千百年公案”。（严羽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》自评其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语）如周必大《二老堂诗话》考证陶渊明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诗说：“江州《陶靖节集》末载，宣和六年，临溪曾絃谓靖节《读山海经诗》，其一篇云：‘形天据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’疑上下文义不贯，遂按《山海经》有云：‘刑天，兽名，口衔干戚而舞。’以此

句为：‘刑天舞干戚。’因笔画相近，五字皆讹^①。岑穰、晁詠之抚掌称善。余谓玆说固善，然靖节此题十三篇，大概篇指一事。如前篇始终记夸父，则此篇恐专论精卫衔木填海，無千歲之寿，而猛志常在，化去不悔。若并指刑天，似不相续。又况末句云：‘徒设在昔心，良晨詎可得。’何预干戚之猛耶？后见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第一卷，复袭玆意以为已说，皆误矣。”这个考证，辨伪存真，“论议精确”，“贵发新义”（葛立方《韵语阳秋·凡例》），确实能断千百年之“公案”。

有的则对诗中所咏之事源进行考辨，使之去伪趋正。如《珊瑚钩诗话》考“端午”云：“端午之号，属于重九；角黍（粽子）之事，肇于风俗。昔屈原怀沙患死（按：“沙”，当长沙地；《怀沙》是屈原自投汨罗江前的绝笔，入《九章》），后人每年以五色丝络柜枚（即柜枚，一种甜食品）而吊之，此其始也。后世以‘五’字为‘午’，则误矣。”（卷二）经过诗话的考证，方知“端午”实为“端五”之误，不过人们已经约定俗成罢了。

有的则介绍了作品的写作背景，有助于读者对诗的理解和对诗人的研究。如《韵语阳秋》卷六：元纳刺道州，承兵贼之后，征率烦重，民不堪命，作《春陵行》。其末云：‘何人采国风，吾欲献此诗。’以传考之，（元）诸国人困甚不忍加赋，尝奏免租税及和市杂物十三万緡，困乏流亡（者）尽归。”这段材料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《春陵行》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作者的爱民思想，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诗话中的评论，有对诗人的总论，也有对诗集的总论；有对某几首诗的赏析，也有对诗中字、辞、句韵评品；总之，凡“诗人篇咏，咸参稽抉摘，以品藻其是非，不以名取人，亦不以人废言，质事理”（南宋沈洵序《韵语阳秋》）对于我们研究作家作品，探讨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系列理论问题，诸如真实性、典型化、立意、意境、风格、意象、趣味、用典、对仗、章法、气脉、格律、比兴、源流、流派等等，都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上述诗话的记事、评论、考证三项内容，对于一部具体的诗话来说，往往兼而有之，不过有时各有侧重要了。

除此之外，诗话还有极重要的辑佚价值。除保存散佚作品之外，许多罕见的、甚至已绝的重要文史资料，都是靠了诗话才得以保存下来的。如《后村诗话》所载宋代诸诗，“其集不传于今者十之五六，亦皆赖是书以存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）而一部蔡正孙的《诗林广记》共辑得诗评资料一百七十余种，而这些资料又“散出于百氏之家，虽博雅君子，未易遍观。”（张翊《重刊诗林广记序》）

由此看来，诗话实为具有诗歌评论和笔记小说两者的特点，而介于诗论和笔记之间的一种特殊文体。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文艺性的诗的学术论文。它记录杂事，往往有人物，有情节，有对话，有描述，确乎“颇近小说”，引人入胜。不过它却没有小说之荒诞，也避免了笔记之冗杂，兼有学术与文艺两者之长。而在一般情况下，诗话并不重于文艺而偏于学术，寓诗理于叙事之中。“文艺”是它的手段，“学术”才是它的目的。其特色，是“在轻松的笔调中间，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；在严正的批评之下，却多少又带着诙谐的成分。”（郭绍虞《宋诗话辑佚·序》）似乎属于一种“边缘”学科。

诗话的这种独特性质，与它的渊源有直接的关系。

溯其源头，一是先秦以来的各种诗文评论。这些评论，包括对诗歌的社会功用，创作特征及过程、表现手法与特点、意境、风格等理论问题的探讨和阐述，以及对诗人诗作的品评。这些诗文评论，主要出自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钟嵘的《诗品》、皎然的《诗式》、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等。二是前代的笔记小说。诸如对诗人逸事的记载，对诗坛掌故的评述，以及对某些诗艺的直接论评。这些则主要出自于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、唐孟棻的《本事诗》、唐范摅的《云溪友议》、五代王定保的《唐摭余》、宋孙

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、苏轼的《东坡志林》、北宋王谠的《唐语林》、南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、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、张邦基的《墨庄漫录》、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、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、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、周密的《齐东野语》等。这两个源头在诗话这里合流了。

诗话的演变，从偏于记事到偏于论理，从零星的品评到系统的理论，可以说是宋人诗话发展的总趋势。诗话之始，往往是“资闲谈”、“自遣适”之作，故多为叙事，并显得零星，片断，轻松，自由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是“退居汝阴”之后，无事可做，“而集以资闲谈也。”黄彻《碧溪诗话自序》也说他：“投印南归，……平居无事，得以文章为娱，时阅古今诗集，以自遣适。”同乡陈俊卿作序又认为他的诗话本是一种“聊以自娱”的作品。既然是“资闲谈”、“自遣适”，那当然就不可能板起面孔讲大道理了。后来姜夔《白石诗说》出，则由偏于叙事转为偏于诗论。在三十则的说诗中，从诗的辨体，到诗的立意、布局、措词、说理、写景、状物等一系列技巧和方法，都论述得明明白白，而几乎全无一点记事。由《白石诗说》到《沧浪诗话》则更进一步，其理论性和系统性更为加强，已经发展为纯粹有关诗歌理论的专著了。诗话至此，轻松之味道大减，一变而为严肃的论诗说理了。

诗话，也是对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。在宋人诗话中，可以读到许多有关创作的甘苦之言。对“苦吟”的说法，即为一例。《全唐诗话》卷五载卢延让《苦吟》诗云：“莫话诗中事，诗中难更无。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。险觅天应闷，狂搜海亦苦。不同文赋易，为著者之乎。”又载裴说《洛中作》云：“莫怪苦吟迟，诗成鬓亦丝。鬓丝犹可染，诗病却难医。山暝云横处，星沉月侧时。冥搜不易得，一句至公知。”如若自身没有作诗的甘苦，是绝然写不出这种诗的。王若虚《滹南诗话》引《眉山唐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八《自说》云：“吾作诗甚苦，悲吟累日，仅能成篇，

初未見可益處；明日取讀，疵病百出；輒復悲吟，累日反復改正，稍稍有加；數日再讀，疵病復出。如此數四，方敢示人。然終不能奇也。”^②有了如此“悲吟累日”的切身體會，才會對“苦吟”的問題作出那樣理論的概括。但經驗一旦上升為理論之後，又反過來指導和提高詩歌的創作實踐。姜白石說：“不知詩病，何由能詩？不觀詩法，何由知病？”（《白石詩說》第十一則）觀了詩法，知了詩病，就懂得了原來不應該那麼寫和應該這麼寫了，这样就增強了自覺性，而減少了盲目性。如此，詩人在創作的時候，就能够比較自覺地運用許多的方法和技巧，以使詩寫得更好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姜夔才說他的《詩說》之作，“非為能詩者作也，為不能詩者作，而使之能詩；能詩而後能盡善之說，是亦為能詩者作也。”（第三十則）可見，作為理論概括的詩話，對詩歌的創作，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！當然，談讀詩話，還不是學詩的根本。陸游說：“汝果欲學詩，工夫在詩外。”（《示子遹》）最根本的還是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同時下功夫。這裡所說的“理論”，自然也包括了對詩話的學習和研究。

詩話的作用和價值還不僅如此。“論其考核有據，闡明作詩之本事，或網羅散佚，吉光片羽，賴以僅存，則有裨於文學史的研究。論其上下古今，衡量名著，摘舉勝語，時於其間流露一己之文學見解，則又有裨於文學批評之研究。”（郭紹虞《宋詩話輯佚·序》）這就是說，詩話對於整個古代文學的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，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。

這樣看來，詩話雖出于“閑談”，但它的作用與意義，卻不可低估。如果以為它“徒資談笑之樂”，而矢口否認它的巨大價值；或者抱着士大夫的輕薄態度而臆斷它“鮮有益于後學”（引文見宋人黃永思跋《碧溪詩話》），這就不僅表示自己的無知，簡直有點“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謗傷！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”（韓愈《調張籍》）的味道了。

毋庸諱言，宋人詩話，其內容亦有不健康、不科學的東西在。

诸如有道听途说、捕风捉影不加详考而以讹传讹者，如《竹坡诗话》所载：“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，犹未能言，一日，其家人携以登楼，忽自语如成人。因戏问之：‘今日上楼，汝能作诗乎？’即应声曰：‘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怕惊天上人。’”其实，此诗为李白《夜宿山寺》诗。一乳儿岂能哉！显为谬传。有宣扬荒唐的“女色祸国”者，如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九：“人君不能制欲于妇人，以至溺惑废政，未有不乱亡者。桀奔南巢，祸阶妹喜；鲁威灭身，惑始齐姜。妲己、褒姒以至张、孔、杨妃之徒皆是也。吴之于西施，王之耽惑不灭于诸后，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，郑寢夫诗云：‘十重越甲夜成围，宴罢君王醉不知。若能破吴功第一，黄金只合铸西施。’”有荒诞不经者，如吴开《优古堂诗话》：“陈正敏《遁斋闲览》载：杨勣中年得异疾，每发言应答，腹中有小声效之。数年间，其声浸大。有道士见而惊曰：‘此应声虫也，久不治，延及妻子。宜读《本草》，遇虫不应者，当取服之。’勣如言。读至雷丸，虫忽无声，乃顿饭数粒，遂愈。正敏其后至长汀，遇一丐者，亦有是疾，环而观者甚众，因教之使服雷丸。丐者谢曰：‘某贫无他技，所以求衣食于人者，唯藉此耳。’以上皆陈所记。予读唐张鷟《朝野金载》，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，语即喉中应之，以问普医张文仲，张经夜思之，乃得一法，即取《本草》令读之，皆应，至其所畏者即不言，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，应时而止。乃知古有是事。”所记不仅内容荒诞，而且与诗亦无关。还有胡言鬼神者，如《全唐诗话》卷二“李道昌”条下言：“道昌，唐大历十三年为苏州观察使，一日，郡城外虎邱山有鬼题诗二首，隐于石壁之上，云：‘青松多悲风，萧萧声且哀。南山接幽院，幽院空崔嵬。白日徒昭昭，不照长夜台，虽知生者乐，魂魄安能迴？况复念所亲，恻然心肝摧。恻哭更何言，哀哉复哀哉！’又曰：‘神仙不可学，形化空游魂。白日非我朝，青松为我门。虽复隔幽显，犹知念子孙。何以遣悲惋，万物归其根。寄语世上人，莫厌临芳樽。庄生问枯骨，王乐成虚言。’

道昌异其事，遂具奏闻，准敕令致祭。……祭后经数日，再有诗一绝于石云：‘幽冥虽异路，平昔忝攻文。欲知潜昧处，山北两孤坟。’后于寺山之北，果有二坟极高，荆棘丛茂，询诸耆老，竟不知何姓氏，至今犹存。”类似此类胡言鬼神诗事者，在宋人诗话中确为糟粕。还有以诗为讖者，如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：“秦少游词云：‘春去也，落红万点愁如海。’今人多能歌此词。方少游作此词时，传至余家丞相，丞相曰：‘秦七必不久于世。’少游第七，故云秦七。”这位丞相以诗为讖语，实是唯心论的观点。

上述诗话中的糟粕，无疑是应当扬弃的。然而决不能因为有糟粕而否定诗话的巨大作用和不朽价值。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评赵与麟《娱书堂诗话》说：“所取或涉于庸腐，然名章隽句，轶事遗文，亦络绎其间，未可以其芜杂并弃其菁华也。”这实在是我们应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

宋人诗话的种类，大致可分为专门和汇编两大类。其中专门一类，又可别为载诗辑评和阐述诗学理论两种。前者可说是诗选和诗评的结合体，是作品和评论的汇编。如蔡正孙的《诗林广记》，选东晋、三唐、北宋计五十七名诗人的诗作六百七十一首（包括附诗），所引记事或系评的资料书约一百七十余种。编者选诗的标准只限于有评语可辑的，将有关资料中对这些作品的评论罗集附于相关的诗篇之后。据蔡氏自己说入选作品“凡出于诸老之所品题者，必在此选”（自序）；而所辑诗评又是“单言只句，品议无遗。”（张鼎《重刊诗林广记序》）这部分诗话，对保存一些作家的佚诗和佚失的诗话，对整理和辑补作家的诗集和诗论，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后者则是一种系统的诗论了。如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，其中之“诗辨”，探索诗的原理；“诗体”，叙述历代诗派和各种诗歌的体裁；“诗法”，论述作诗的方法；“诗评”，品评前代作家、作品；“考证”，则是对于前代和本朝诗的内容和形式流变等的考据。总之，专门一类诗话，不管是载诗辑评的，这是阐述诗学理论的，都是理论性很强的专门著作，

作者为一人，内容也专一。

汇编一类诗话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它所收内容博杂，所集作者众多。此类诗话又有三种形式。

一是从各别诗话或笔记中分类选录的。其中以事为纲者，如南宋魏庆之的《诗人玉屑》；以人为纲的，如南宋胡仔的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。还有专人的诗话汇编，如蔡梦弼的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，专论杜诗；专事的诗话汇编，如计有功的《唐诗纪事》，专纪唐诗事；专代的诗话汇编，如袁宏的《全唐诗话》，专论唐代诗；专地的诗话汇编，如缺名残篇之《洛阳诗话》，专辑有关洛阳一地的诗话；专派的诗话汇编，如刘克庄的《江西诗派小序》，专论江西诗派；专体的诗话汇编，如张天觉的《律诗格》，专论律诗。

二是将数种或数十种诗话著作汇编而成的诗话丛书。如北宋阮阅的《诗话总龟》（原名《诗总》，又名《百家诗话总龟》），汇编百家诗话而成。

三是从诸书中对已佚的诗话钩沉整理的诗话辑佚，如郭绍虞先生的《宋诗话辑佚》。

宋人诗话，究竟有多少，至今不能确指。据罗根泽先生探讨，大约将近百种（参见罗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三），而郭绍虞先生《宋诗话考》，则开列多达一百三十九种，这包括部分流传或由他人辑成书的以及已佚而仅知其名的。最近有人于郭先生《宋诗话考》外又考出：方焘《方焘诗话》、佚名《百家诗话》（亦名《百家诗序》）、谢枋德《叠山诗话》、胡舜陟（胡仔父，别号三山老人）《三山居士诗话》、罗良弼《罗良弼诗话》、李淑《诗苑类格》、张天觉《律诗格》等七种宋人诗话。（参见李裕民《宋诗话丛考》，中华书局《文史》第二十三辑）而最新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《中国历代诗话选》（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版）八卷，其中北宋诗话一卷（第二卷），南宋诗话一卷（第三卷），共辑录宋代诗话（编选“凡